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

——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李祖德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关键词:《黑骏马》;“归乡”叙事;知识分子道路;《故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3-0105-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311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张承志是一个独异的存在,并一直和文学“主潮”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疏离”关系。“保持”关系意味着他究竟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而“疏离”意味着他的写作与“新时期/文学”和“八十年代”形成了特殊的思想与美学张力。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似乎都很难为张承志找到一个恰切的“文学/历史位置”。有论者认为,张承志小说中的抒情性、思想学术性以及90年代以来的“非虚构”等倾向,尤其是其独特的“中国”观,构成了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张承志难题”^{[1]64}。

身处“新时期”或“八十年代”的张承志如何重新思考启蒙与革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则可能隐含着“张承志难题”更复杂的难题性。这些根植于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叙事中的“老问题”并非随着“历史终结”“告别革命”或“新时期/文学”的来临就自然解决或自行消解了,也并非因为张承志的革命情怀、宗教意识和孤绝的道德理想主义就自然有了他的答案。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1982)及其“归乡”叙事隐含着他对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考。事实上,在“新时期”以来张承志的思想探索与写作中,这些“老问题”也一直保持着具有相当强度的思想力和挑战性。

一、“归乡”叙事与启蒙思想的遗产和“债务”

(一)《黑骏马》“归乡”叙事的隐性结构

《黑骏马》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后文简称“我”)两次“归乡—离乡”的经历,最终

收稿日期:2023-02-03

作者简介:李祖德(1975—),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学。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研究”(14XZW023)。

“修正了自己当年‘纯洁的理想’，与生活和解。这似乎意味着张承志曾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了自己一直坚守的另类理想，拥抱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不过很快，随着东渡日本从事学术研究，与主流文坛拉开距离，使得张承志笔下的回忆再一次表现出极强的异质性，成了对庸常、肤浅的当代社会的抨击”^{[2]126}。“纯洁的理想”事关主人公的爱情和亲情，也事关叙述者“我”作为一个启蒙者/知识分子对“故乡”或“底层/民众”的思想与情感立场。从“新时期/文学”初期开始，当同时代的作家热衷于历史“伤痕”的揭示和“反思”书写，或执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与“异化”的争辩，或转而探索“文学性”“怎么写”“先锋性”的时候，张承志关注的仍然是普通人的现实人生，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与道路等问题。即是说，张承志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就已经显示出了他之于主流文学话语和经验的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一直存在于他后来的思想探索和写作中。

关于《黑骏马》的构思与写作，张承志曾经说道：“我把熟识的几个草原女性的生活故事编织了一下，写成了中篇小说《黑骏马》。它不是爱情题材小说——我希望它描写的是在北国，在底层，一些伟大的女性的人生。”^{[3]78} 这些关于“底层”和“伟大女性的人生”的思考固然来源于叙述者/主人公的生活与情感经历，但着眼于小说本文，可以发现这些思考也来源于其独特的“结构”与“形式”，正如张承志所解释：“我突然想到了结构——如果民歌在时间的考验后证明是生活的精华的话，那么，这民歌描述的生活及民歌的结构，难道不应当就是作品的内容和这内容的结构么？”^{[3]78} 在《黑骏马》本文中，除了蒙古族古歌《钢嘎·哈拉》作为小说的结构要素，还有另一重要的，但也更为隐性的结构要素，即主人公两次“归乡—离乡”的情节线索。“归乡—离乡”在承担有关“底层”“伟大女性的人生”的叙事功能的同时，其本身也隐含着叙述者/主人公思想与情感、经验的深层裂变。在中国现代小说“归乡”叙事的传统和经验的嬗变中，《黑骏马》中的两次“归乡”书写便具有了特别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在“我”身上，同时也在“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这里，“归乡—离乡”的“结构”或“形式”表征了怎样的思想与情感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在形式的尽头与政治相遇”（语出洪子诚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重庆师范大学所作演讲“文本与历史”），或可进一步打开和深入这一“张承志难题”，并呈现张承志的思想与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或“八十年代”的异质性。

要解答上述问题，需要重审中国现代小说“归乡”叙事的传统，如此方能透析《黑骏马》的“形式/政治”与“情感/政治”的表征关系。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者鲁迅所开创的一种小说叙事模式，“归乡”叙事在《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中不但讲述了他人的故事，而且同时还讲述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从而使得这些小说具有了“复调”的叙事结构^{[4]38-39}。这些“归乡”叙事“通过第一人称在叙述非己的故事时，对自我与叙事对象的关系进行反省，从而将主体的精神历程在故事的客观叙述中呈现出来——实际上，这种模式本身便是鲁迅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人生哲学的体现：客观的现实对于‘我’而言不是外在的、与己无关的东西”^{[5]328}。如是观之，“归乡”叙事模式不仅承担着组织情节和结构小说文本的功能，其中，“归来—离去”（“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形式也隐含着 20 世纪早一代启蒙者/知识分子的诸种思想与情感问题。

进一步说，“归乡”是小说叙述者/主人公某种思想和情感的图式化，如此才可能成为一种叙事的“模式”。也正因为作为“图式”，“归乡”才成为并非与意义无涉的、纯粹透明的“结构”或“形式”，它恰恰是“启蒙者/知识分子”“故乡/民众”以及“现代”“中国”“小说”等诸多“现代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汇聚而成的一种“经验/模式”或者“情感/结构”。因而，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归乡”无论是作为人物的经历/经验或小说内容本身，还是作为小说中的“时间”“结构”或“线索”等形式要素，它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现象”与“事件”。也即是说，“归乡”作为一种叙事模式是叙述者/主人公特定思想、意识与情感的形式化。在《黑骏马》中“我”的两次“归乡—离乡”作为隐性结构，亦表征了“我”对自己和“故乡/民众”的不同思想立场及其“历史性”裂变。

(二)《故乡》“归乡”叙事中的启蒙思想遗产和“债务”

作为现代小说“归乡”叙事的经典文本,鲁迅的小说《故乡》(1921)不仅讲述了“故乡”“民众”以及“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沉滞状态和缓慢裂变,也讲述了早一代启蒙知识分子自身面临的那些思想、精神与文化问题。“归乡”叙述者自身的种种精神问题及其与“故乡/民众/乡土中国”的种种精神关系都聚合在《故乡》这一文本的“记忆”“想象”与叙述中。与“故乡/民众”的关系可谓近现代启蒙者/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结构中最具问题性的一个问题。在“现代性”“现代文学”和“近现代中国”交叠的思想史视域中,鲁迅的《故乡》可谓特定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它不仅“再发现”了现代性漩涡中的“故乡”“民众”与“乡土中国”,还发现了其叙述者——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道路”问题,并以此进一步建构了“现代小说”的现代性,为“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叙事传统,也积淀了一份重要的文学与思想遗产。

“归乡”叙事模式的重点之一当然在于讲述“故乡”。无需赘言,“故乡”是古今中外文学中的经典主题、意象或叙述对象之一。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变革中,“故乡”也是“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以及“文化/寻根小说”共享的“典型环境”。“故乡”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还是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和文化想象中,“故—乡”(home-town)一词总是蕴含着传统的、农业文化的价值内涵。“故乡”和自然、农业意象的记忆有关,它不可能是“大都市”(metropolis)。作为“记忆”和文学意象的“故乡”本身也蕴含了其“地方性”和“自然性”。同时,作为自然、地理空间和农业意象的“故乡”,也是一个心理意识层面的时间结构,它意味着“过去”或“传统”,因而不可能是“现在的”或者“现代的”。也因此,“故乡”还是一个有关文化、价值与身份认同的情感结构,它意味着“乡情”“乡恋”“乡怨”或“乡愁”。经过“现代/文学”的反复想象、书写与建构,“故乡”逐渐成为一个“现代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现代的文学话语结构。“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人的情感史里,故乡情结指认的,是一种以乡村为场地背景的亲情文化,是对外来文化、城市化及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躁动、生疏和焦虑感的想象性补偿”^{[6]356}。“故乡”蕴含着叙事者自我生命、人生以及社会问题等不同维度的价值,从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也成为“现代/文学”建构的一套关于“底层/民众”或“乡土中国”的叙事系统和“神话/话语”系统。

但“故乡”的叙事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为“谁在讲述故乡”“什么样的故乡”以及“谁的故乡”等问题,才能真正呈现它的现代性和问题性。因而,“归乡”叙事另一重点在于叙述者/主人公的“归”这一行为和经历。正因为叙事主体的特殊视角和思想情感对前现代“故乡”的“再发现”或“风景再造”,才使得《故乡》及其“故乡”叙事获得了它的现代性,现代的“故乡”也因此才获得了不同于古典“故乡”的问题(难题)构成。

在“现代/文学”的叙事中,“故乡”已不再是作为地理空间场所的纯粹的“原风景”,也不再是生命本真性所在的永恒之“家园”,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有关“前/现代中国”的“剪影”或“风景”。而且,“‘我’的故事,‘我’的叙述和实在性,唯有通过‘我’和故乡的关系才获得意义。故乡是‘我’的镜像,故乡是构成‘自我’的他者”^{[6]49}。因此,在这片“风景”中还孕育了一个现代的启蒙者/知识分子主体和“故乡/民众/乡土中国”的叙事主体。这个主体用现代的眼光,怀着复杂的心理和情绪回望、凝视着,并讲述着“故乡”。“他扮演了一个久别故乡的或具有新文化特点的陌生人的角色,完全以一种新的、不同于故乡文化的观点来观察故乡的人与事,于是那些消融于日积月累的毫不新鲜的经验中的东西,在新的眼光的凝视中产生了全新的意义”^{[5]344}。作为文学意象和精神价值现象,前/现代的“故乡”想象以及“故乡”的现代性,乃在于“故乡”里交织着启蒙者/知识分子有关“过去—现在”“传统—现代”“文明—蒙昧”“都市—乡村”“故乡—异地”以及“知识分子—民众”或“启蒙—反(思)启蒙”等种种文化与价值选择的难题。“归乡”叙事模式在发现了前/现代的“故乡/民众”或“乡土中国”的同时,也建构了启蒙者/知识分

子自身的主体身份及其叙事的视角和视界。

因此,就上述诸种“现代”问题而言,“归乡”叙事模式又并非一定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的原创与发明。它乃是挣扎于“传统—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中的启蒙者/知识分子之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的形式化表征,表征了他们面临上述问题时所产生的精神分裂症。而在现代性的生存境遇中,“归乡”叙事模式也表征了“现代人”的普遍的生存/文化经验,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传统—现代”的二元历史/时间观,以及前/现代的“故乡/民众”始终未完成的,并一直在持续展开的现代性。对于现代人而言,“故乡”的意义不在于它能提供多大程度的“美好家园”的归属感和精神抚慰,而在于它表征了“现代人”生存与存在的漂泊性,汇集了身处“现代”的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悖论。“‘故乡’其实是一个永远不能归去的‘家’,现实的苦难使这种‘寻找归宿’的愿望彻底破灭——由此,故乡的现实、闰土的故事……被纳入了‘我’寻找‘家’的精神过程,叙事对象的客观社会意义与‘我’体验到的‘隔膜’虽然保持着独立的、不可忽视的意义,却是在‘我’的迷惘与追寻的精神历程中获得呈现,而这一精神历程正构成了小说的精神底蕴”^{[5]346-347}。因此,“故乡”的现代性正在于它的“无根性”,与其说“故乡”是现代人的生命、情感与文化的“原乡”,不如说它是一系列现代性叙事的起点,无论是“启蒙”还是“反(思)启蒙”的叙事,也无论是“个人的”“阶级的”还是“民族国家”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归乡”叙事的启蒙思想遗产在于:既发现了“现代”和现代的“故乡/民众”,也建构了“现代”的叙事主体,从而建构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

在《故乡》中,“我”的最终离去隐含了启蒙者/知识分子的焦虑、溃败与逃逸,“五四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回城将故乡写入小说,将‘启蒙’转化为‘启蒙叙事’,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也由此制造了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回乡困境——想象中相通但面对面隔膜、回乡失语但回城写小说,因为‘启蒙叙事’不过是一种话语再造和代言发声,并非实践改变和现实颠覆”^{[7]157}。因而,“归乡”的真实意图和目标不在于“故乡”,而在于“走异路,逃异地”。“‘我’的返乡,是迁徙的延续,是一次必然的失落,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6]50}小说中的“我”回故乡变卖祖屋,又离开故乡的情节,与鲁迅本人于1919年冬天回绍兴变卖祖屋的经历,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精神史上一个重要的,具有互文关系和隐喻关系的“事件”,表征了现代人和启蒙者/知识分子的自我流放,也寓示他们在“离乡”之后永无止境的精神与身体漂泊。甚至,在《故乡》中,作为叙事主体和启蒙者/知识分子的“我”还被“故乡”所放逐:如果说“幻灯片事件”中的“我”是“从一个现代/西方规训的空间中放逐,那么后者(《故乡》中的‘我’——引者注)则是从被前现代/中国的空间所放逐。在这个意义上,‘我’游离了教室、铁屋子、故乡等不同的空间,留下了不同的印痕,同时也改写或建构着自我的主体位置”^{[8]65}。就此而言,启蒙者/知识分子主体身份的破缺与悬而未决的“思想道路”问题是“归乡”叙事在留下丰厚启蒙思想遗产的同时所衍生的思想“债务”。

那么,对于“现代人”,尤其启蒙者/知识分子而言,“我”是谁?“我”要向何处去?“故乡/民众”究竟是什么样,又会怎么样?“我”又如何重新思考、讲述和处理“知识分子”与“故乡/民众”的关系?重新追问这些经典的启蒙叙事的“老问题”,以进一步清理作为启蒙叙事的“归乡”所遗留的思想遗产和“债务”,也是为了更深入地透析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张承志及其《黑骏马》重新思考和处理这一遗产/“债务”的思想与方法。

二、《黑骏马》“归乡”书写中的发现与抉择

(一)第一次“归乡”书写与启蒙思想遗产的继承

就“离去—归来”的结构与形式而言,《黑骏马》与《故乡》已构成了显在的互文关系。《黑骏马》由

两条“归乡—离乡”情节线索交织而成,从而形成了一个叙事的“套层结构”。“我”的第一次归乡是“过去时”的:多年以前,“我”为求学而离开家乡,后回到家乡发现青梅竹马的“妹妹”索米娅怀上了恶棍黄毛西拉的孩子,而“我”不能接受这一切再次离开了家乡。学成归来的“我”已然具备了一个启蒙者/知识分子的特征:“我”怀着对索米娅美好爱情的期待,也怀着改变草原落后生产方式,以自己的知识回报家乡的热忱归来,但“我”对草原的乌托邦式情感与想象被现实无情击溃。甚至当“我”只希望索米娅能向我倾诉她的痛苦和屈辱而准备接受她的一切,“我”依然没有获得她的回应,“我”只有在爱情和理想挫败的痛苦与绝望中离去。

“我”在第一次归乡之前,并没有料及归来的结果。而《故乡》中的“我”其实在归去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与“故乡”的隔膜,“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而且“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9]501}。显然,“归乡”并非此番行程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在最后的“离乡”之前和“故乡”进行感情上的了断。“如果不回乡,如果不消除记忆中对于故乡的虚假印象,‘我’就无法离开、无法超越故乡的边界、无法去往别处:‘我’将会被永远困在一个乡愁般的过去之中”^{[10]91}。而在《黑骏马》中,“我”却是在第一次归乡的热切期盼中才渐渐发现了一个陌生的、“蒙昧”和“野蛮”的、回不去的而且是完全不属于“我”的故乡。“我”的乡恋以及美好的爱情、亲情,在“我”第一次“归乡—离乡”的经历中发生了悲剧性的骤然的断裂。

但这已经不是一个关于爱情忠贞或背叛的故事,甚至也不是一个有关“寻亲”的寻常伦理故事。《黑骏马》与《故乡》真正的互文性在于:它们都讲述了一个启蒙者/知识分子是如何被现实击败而被“故乡”放逐或“自我”放逐的故事。无论是《故乡》中“我”的离去,还是《黑骏马》中“我”的离去,都表征了启蒙者/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前现代“故乡/民众”时思想情感与审美想象的挫败,也表征着作为“精神游子”的——现代人的——整体性的——“无根性”生存困境。两个文本中的“我”都从“绝望”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就此而言,《黑骏马》继承了《故乡》的启蒙思想遗产,二者之间也构成了20世纪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潜在的“对话”与“回应”关系。

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时空里,中国现代小说的观念、情感与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衍变,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经验与情感也持续发生着极为复杂的动荡与调整。但启蒙者/知识分子对于“故乡”“民众”“乡土中国”的思想与情感之困,仍时时缠绕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情感之中。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黑骏马》仍然在探索这样一个思想问题:当代的知识分子何以克服并解决那些“现代”问题?作为“当代作家”的张承志,在《黑骏马》中又是如何处理“归乡”叙事的启蒙思想“债务”的?

(二)第二次“归乡”中的发现与启蒙思想“债务”的清偿

“我”第二次归乡的情节线索则是“现在进行时”的,也是小说本文的主体结构。多年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我”终于想起来应该回去看一看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于是借考察工作之机再次踏上了归乡的路途。经过一路寻访,“我”“回归”的并非是曾经生活的“原地”,而是索米娅远嫁的“他乡”,但“我”却由此渐渐“发现”了另一个“故乡”的存在,并真正领悟了“故乡/民众”的灵魂和自我的位置。在小说的“套层结构”中,“我”的再次“归乡”涵括、覆盖了但又打破了第一次“归乡—离乡”的叙事结构,完成了对第一次“归乡—离乡”中的思想与情感问题的回应、转换与解决,从而形成了小说本文内部的互文性结构,也再次与鲁迅《故乡》形成了(新的)“互文”与“对话”。

不难看出“我”在此番归乡途中的“忏悔”与“补偿”的心理动机。作为男人和兄长,“我”愧疚于没有尽到对“家”和“亲人”的责任,于是“我”答应愿意接受索米娅说给其其格的谎言,还做了一些“补偿”:送了一些文具给其其格,索米娅也因为“我”的帮助成为小学的小学正式职工。当看到学校里养起了黑白花的荷兰牛时,作为草原之子,“我”也有了些许回报草原家乡的欣慰。因而,此番“归乡”也不是“我”的真正意图,也可能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或因城里生活的茫然和失落,或因无力继续前行的困顿,

“我”都必须再次“归乡”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我”为补偿“故乡”和“亲人”而来,也为补偿自己或自我救赎于愧疚和罪感而归。

但“我”这种出于忏悔或补偿的心理动机并不能视为一个简单的情感与伦理问题。仅仅是自我愧疚或罪感的纾解,也并不能真正克服“我”作为“现代人”或“启蒙者/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和悲剧性。“我”的愧疚,究竟是因为“故乡/民众”的“蒙昧”,还是因为“我”本身的某种“执念”,或某种关于爱情和“纯洁理想”的意识形态?作为“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我”又何以回报养育“我”的“故乡”和“人民”?在第二次“归乡”的叙述中,问题已经转换为“我”如何重新思考和处理自己与“故乡/民众”的关系。

鲁迅的《故乡》“在‘我’对‘变化了’的故乡与闰土的观察中,‘我’也体现了‘我’的变化,‘我’与‘故乡’的真实关系”^{[5]347}。在《黑骏马》两次“归乡”的叙述中,“我”都曾发现过“故乡”以及“故乡”的变化。不过,在第二次“归乡”中,“我”发现了另一重“真实关系”以及“我”自身所处的位置。就像达瓦仓对“我”所说的:“兄弟,我的话可能不好听——说真的,我们早把你忘了。我根本没想到你还会来看看。我以为,城里人就是那么没心肝,亲娘老子死了都不理睬……”^{[11]87}如果说当初离乡的“我”是被“故乡”放逐、挫败的“客体”,但之于“故乡”而言,“我”可能恰恰是一个背叛、逃逸的“主体”;然而,“我们早把你忘了”,“离乡”之后的“我”又渐渐变成了被“故乡”遗忘的“客体”,“故乡”则变成了遗忘“我”的“主体”;而今,“没想到你还会来看看”,“我”与“故乡”的“真实关系”正在持续发生着微妙的转化。

同样,当“我”与索米娅重逢时,也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情景,但一种微妙的新的“主—客”关系也渐渐显现出来了:

索米娅用力拽着牛鼻绳,大步迎面走来。她笑着向我问好:“呵,白音宝力格!我听达瓦仓说你来啦。怎么样,路上累么?工作好么?你还是老样子!嗨——嘿!”她使劲拉着缰绳。

她牵着首车的一头红花牛,和我并排走着。她并没有哇地哭出来,更没有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甚至也没有喊我“巴帕”,她丝毫没有流露对往事的伤感和这劳苦生涯的委屈。甚至在我挡开她,用力挥着三齿耙和平底锹,替她把那四车煤炭卸在学校伙房后面时,也是一样。她随口说着什么,若无其事。^{[11]89}

此时的索米娅已不是《故乡》第一人称的独白和白描中的“中年闰土”,她“若无其事”的沉默已经告诉了“我”她并没有等待“我”的归来。“故乡”“亲人”及其“大地生活”有它永远“变”与“不变”的法则,没有“我”,“故乡”的“亲人”仍然会继续他们“变”与“不变”的生活、历史和命运。同样作为草原之子,“我”与达瓦仓相形见绌,“我”何以回报故乡、亲人的养育之恩?这或许就是启蒙者/知识分子或“精神游子”永远无法克服和超脱的不安与罪感。但究竟是“故乡/民众”不能理解“我”的绝望和孤独,还是“我”不能理解“故乡/民众”以及他们的“变”与“不变”?“故乡/民众”也并非天然的“沉默的他者”,在《黑骏马》第一人称的独白与抒情中,“故乡/民众”渐渐凸显出了它内在的“声音”、精神和主体性。“正是发现了这种人民精神世界深处的神彩,张承志才轻轻地拂去了悲悯的情绪,而把一种对劳动者的尊敬,注入了他的诗篇中”^{[12]48}。“故乡”和“亲人”养育了“我”,但即便“我”从来不曾,终究都不会真正属于“故乡”,回到“故乡”。当“我”长大成人,羽翼丰满,“故乡”也会放“我”远走高飞,去追寻那“纯洁的理想”:

“别记恨我吧,白音宝力格!”她用微弱的声音喃喃着。“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反正这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你啦……”

过了许久,她猛然昂起头来,用一种异样的、嘶哑的声调大声问我:

“为什么你不是其其格的父亲呢?为什么?如果是你该多好啊……哪怕你远走高飞,哪

怕你今天也不来看我!”^{[11]92}

“如果你”自然该是多好的事,即便“我”离去,但只要还保存着某种关系或“联结”,无论是某种“自然、真实”(共同生育)的关系,还是某种“想象”与“认同”的关系,“哪怕今天也不来看我”,“家”“亲情”“爱情”都会得到应允和保证。重要的不是“离去”,而是内心的“拒绝”与“否认”,就像“我”当初离开时曾对索米娅说:“这里是你的家啊。”“是我该走了……索米娅,奶奶,我要走了。”^{[11]82}相反地,索米娅搪塞其其格的“谎言”实际上已翻转成为一种“想象”或“认同”,甚至是一种“诺言”,这个“谎言”已袒露出了她对某种关系或“联结”的认同与坚守。于是,在第一人称的独白中,“我”和“故乡”的“主—客”关系再次发生了微妙的互转,一种“对话性”或“主体间性”产生了。

当“我”初到索米娅家时,看到了杂物间里还堆放着“我们”曾经住过的蒙古包的一些旧物,“我”这才发现,“故乡”其实和“我”一样也在流逝的时间和日益变革的时代辗转流徙,就像额吉曾嫁到了伯勒根草原,也像妹妹索米娅从伯勒根草原远嫁到白音乌拉山。但“故乡”始终在他们身旁和心中,曾经的共同生活经历与记忆依然牢牢地维系着他们对于“家”与“故乡”的认同:“西墙上还有一个小门,我推开那小门,一眼看见一个蛛网尘封的黑黝的蒙古包木格天窗。旁边堆着折叠的哈那墙,俄尼棍,还有一扇紫红色的小木门。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祖孙三人,还有黑马驹曾一块生活其中的那个家……”^{[11]82}这一情景提供了一个“契机”,不但让此番“归乡”产生了新的意义,让“我”领悟到了重新联结“故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且还为“我”克服自己内在的分裂,再次从“绝望”出发,为实现真正的精神“归乡”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清偿“归乡”叙事的思想“债务”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三) 人民伦理与“共同体”的重建

《黑骏马》中“我”的第二次“归乡”可以理解为一个启蒙者/知识分子试图重建自己与“故乡/民众”的关系,并修复自身的主体性与身份认同,正如张承志在小说本文中写道:

在古歌《黑骏马》的终句里,那骑手最后发现,他在长满了青灰色艾可草的青青山梁上找到的那个女人,原来并不是他寻找的妹妹。小时候,当我听着这两句叠唱的长调时,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成年以后,当我为思念索米娅哼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支古歌在这儿完成了优美的升华。它用“不是”这个平淡无奇的单词,以千钧之力结束了循环不已的悬念,铸成了无穷的感伤意境和古朴的、悲剧的美。^{[11]94}

一系列“不是”的歌句表达了古歌中抒情主人公“寻找”的心声,也透射出“我”归乡的心迹。而一唱三叹中的“不是”正意味着抒情/叙述主体想要获得的是最后的“是”或“肯定”。古歌的意境启迪了“我”,那么,“我”追寻的究竟是谁?或是什么?在小说的“故事”中,自然是索米娅或者“故乡”和“亲人”,但是,“我深深感到了一种带有历史意味的庄严,感到了一种富有艺术底蕴的矛盾,感到了描写这种普通人民生活的教育意义,也感到了只有完成这种艺术概括,我和错爱我的那些牧人间曾有过的美妙的一切才不至于再去忍受讥笑”^{[3]78}。

也因此,“我”的第二次“归乡”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伦理意义,它不仅让“我”重新“发现”了“故乡/民众”,也让“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位置、身份和意义。小说表层叙事结构中有关爱情、亲情的“伦理”叙事获得了更高层次的“人民伦理”的意义。“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和草原的收养者,伯勒根草原并不是“我”的出生之地,“我”与额吉、索米娅之间也并没有原生性的血缘关系。“我”所追寻的并不是源自血缘、亲情和爱情意义上的“自然情感”,而是一种对“共同体”及其伦理的记忆与认同,就像索米娅在迁徙生存的路途中仍然带着“我们”曾经的“家”那样。《黑骏马》以超越血缘、亲情乃至民族、文化的视界,从一系列“不是”的追寻和追问中获得了最终的“是”,以“母亲”“妹妹”“草原”“故乡”的情感与伦理叙事建构起了一个更为辽阔的“大地/人民故乡”或更高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三、在“归乡”的不可能中保留可能性

(一)“归乡”的不可能与可能性

在现代性境遇中,启蒙者/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难以跨越的“厚障壁”并非一个立场、情感与伦理的问题,也并非一个简单的“如何与民众相结合”的思想与政治问题。问题在于:在不断追寻“现代”“文明”“进步”的启蒙想象与叙事中,启蒙者/知识分子确立起了特定的生活目标、历史目标,但“故乡/大地/民众”天然的“原生态”“蒙昧性”或“无目的性”注定了启蒙者/知识分子“归乡”的不可能性及其悲剧性。在鲁迅的《故乡》中,当面对杨二嫂指控“闰土偷了碗碟”这件事时,“我”并未表现出任何反应^{[13]70-71},而是转而描述杨二嫂令人生厌的动作行为,这固然体现了小说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的功能和效果,但叙述“视角”和“距离”可能隐含着叙述者的某种自我“克制”的复杂心理。在《黑骏马》中,“我”“决心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它的丑恶”^{[11]80},这又何以可能呢?所谓“归乡”的不可能性源于现代性境遇中启蒙者/知识分子的知识、理想或历史目标与“民众”或“大地生活”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看起来,《黑骏马》似乎克服并解决了20世纪早一代启蒙者/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它甚至以一种不乏平民主义(popularism)的立场抒写着对“故乡”“草原”“大地”“母亲”“亲人”和“人民”的愧疚、依恋和赞美之情。在经历了第二次“归乡”之后,“我”似乎也只有以不断的“归乡”倾诉“我”的“忏悔”,并不断地提供“补偿”以获得自我的救赎:“我想把已成为过去的一切都倾洒于此,然后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就像古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11]95}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断缓解作为一个现代人、启蒙者/知识分子的永恒的精神危机,当然,也只能不断重蹈“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老路”及其叙事“结构”与“形式”。

但也正因为如此,《黑骏马》中“我”的第二次“归乡”却打破和颠覆了上一次“归乡—离乡”的决绝,从而打开了一条不断循环、永不终结的“归乡”之路。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我”毕竟回来了,毕竟与索米娅实现了“家”的重聚,使得“共同体”的重建与延续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故乡》中“归来—离去”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也恰恰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意义“封闭性”。诚然,“我们必须从‘我’和闰土之间无法弥合的裂隙出发,必须从虚无出发,而不是从启蒙和进步的承诺出发,不是从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可能的结合点出发,”“为了这种‘未来’,当下能做的只能是否定和破坏,在一个已然成为废墟的、四分五裂的世界里,消除最后一丝‘过’去的痕迹,为不可预知的偶然性、为未来的事件创造空间”^{[10]94}。然而,充满悖论性和悲剧性的是,“异地”或“远方”不过就是“故乡”或“此在”的延伸和扩展,弃绝了“归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意味着“离去”与“遗忘”的行为本身以及“离去”和“遗忘”之后的“不可能性”:现代人/启蒙者/知识分子“归乡”的不可能性、自我拯救与超越的不可能性,以及“启蒙”本身的不可能性,甚至“故乡/民众”存在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决绝的“离去”就像海德格尔之所谓“死”一样,使一切都不再成为可能。“我”与闰土、索米娅或“故乡/民众”之间再也不可能修复或重建某种关系,只能在一种“无关系的关系”^{[11]96}之中等待某种可能性的降临。《黑骏马》中第二次“归乡—离乡”书写打开的循环不断的“归乡”之路为最后真正的精神“归乡”保留了一种尽管不能保证的可能性。

(二)不断“归乡”的开放性与潜能

《黑骏马》的“循环”反而打破了某种“封闭性”,在不断“回转身来”和“归乡”的行动中为未来创造出一种可能性。对于启蒙者/知识分子来说,要继续前行,追寻“纯洁的理想”或启蒙事业,首先得回过头去“解决”自己过去的思想与情感问题,方能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从而获得启蒙事业与启蒙者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解决”的方法并非只有宿命般的、决绝的“否认”“拒绝”或“离去”,不断“归来—离

去—再归来”的“宿命感”亦有可能转化为“反抗绝望”的潜能。

一旦“启蒙者”或“知识分子”主体自我形塑并如其所是之后,就必然建构了“故乡/民众”这一“他者”,也必然就会形成“启蒙者/知识分子”与“故乡/民众”的间离与张力。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立场、情感与伦理问题,而是“现代”“现代性”甚至“知识”“理性”“启蒙”本身的“诡计”。正如在《黑骏马》中“我”所感受到的:“……也许是因为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吧,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尽管我爱它爱得是那样一往情深。”^{[11]81}但是,启蒙者/知识分子本身来自自己的“故乡/民众”,或者说“民众”本就是启蒙者/知识分子的命定的“故乡”。无论“故乡/民众”在启蒙者/知识分子主体眼里是如何亘古不变的“蒙昧”,但首先承认和接受“故乡/民众”及其生活的“蒙昧性”,并在“归乡”的不可能之中不断地“归乡”,不断地建立与“故乡/民众”的联结,则为“故乡/民众”,也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的未来保留一种可能性。

这正如小说最后当“我”又一次离去之时,索米娅给“我”的“启蒙”并为“我”保留的可能性:“如果,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弃的话,就把那孩子送来吧……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懂么?我养大了再还给你们!”“……啊,你以后结了婚,工作多,答应我,生了孩子送来吧!我养成个人再还给你……”^{[11]94}也诚如张承志所说:“但愿有一天我能尽情尽意地唱出其它歌子,唱出生活、历史和人民启蒙于我的一切。”^{[3]78}身处“新时期/文学”和“八十年代”的张承志没有在“启蒙—革命”或“启蒙—反(思)启蒙”的两极路径中,也没有从历史、人性深处的抽象的“虚无”出发,而是就从启蒙者/知识分子主体自身的“虚无”“绝望”和“分裂”出发,在“启蒙”与“革命”之间,在“离去”与“归来”的悖论性和辩证性关系之中,“将民众从启蒙客体再造为(革命)主体”^{[7]158}。张承志以此思想和方法,在“新时期”继续探寻“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并试图实现启蒙者/知识分子对自我和“启蒙叙事”的超克。

四、结 语

在1921年鲁迅的《故乡》发表60年之后,张承志于1982年发表了《黑骏马》,20世纪中这两个具有“开端”与“终结”意义的年份,也意味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某种“终结”与“重新开始”的“时刻”。身处“新时期/文学”和“八十年代”的张承志及其《黑骏马》在“革命叙事”的“终结处”,也在“新启蒙叙事”的“开始处”,开启了另类的“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

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启蒙叙事”抑或“革命叙事”中,无论是“知识分子道路”的思想问题,还是现代个体主体“反抗绝望”的存在论问题,并非只能局囿于纯粹的哲学思辨的论域。而且,生命哲学或存在主义的命题亦应回到“存在者”及其“存在着”的视界,才能真正体现从“思想”到“行动”的位移。张承志的《黑骏马》在继承《故乡》等早期现代小说“归乡”叙事的思想和文学遗产的同时,也试图清偿其遗留的思想“债务”,在“我”第二次“归乡—离乡”的书写中创造了具有实践性的条件和语境,并试图重建“启蒙者/知识分子”与“故乡/民众”主体性交互激荡的“命运共同体”。这促成了张承志的文学与思想“既内在于80年代,又超越于80年代”^{[1]64}的异质性和难题性。

[参 考 文 献]

- [1] 何吉贤. 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中国观”:理解张承志的一个视角[J]. 民族文学研究, 2016(2): 63-80.
- [2] 李松睿. 回忆的诗学:论张承志的早期小说[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118-126.
- [3] 张承志. 《黑骏马》写作之外[J]. 民族文学, 1983(4): 77-78.

-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 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6] 唐小兵.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 20 世纪[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7] 邱焕星. 再造故乡: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研究[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2):143-161.
- [8] 张慧瑜. 异乡人与“少年故乡”的位置:对鲁迅《故乡》的重读[J]. 粤海风,2009(5):60-65.
- [9] 鲁迅. 故乡[M]//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0] 王钦. “乡愁”与希望的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2):86-97.
- [11] 张承志. 黑骏马[J]. 十月,1982(6):66-95.
- [12] 曾镇南. 《黑骏马》及其他[J]. 读书,1983(3):47-52.
- [13] 藤井省三. 鲁迅《故乡》阅读史[M]. 董炳月,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The Narratives of ‘Homecoming’ and the Problematic of ‘Intellectual Way’ in *Black Steed* by Zhang Chengzhi ——Based on Comparative Reading with *Hometown* by Lu Xun

Li Zud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plenty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s heritages, some problematic thoughts ‘debts’ were left in the narratives of ‘homecoming’ in *Hometown* by Lu Xun, which is a classical thoughts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way of life’. In matters of theme and form, the relationship of dialogue and intertextuality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novelette *Black Steed* by Zhang Chengzhi and *Hometown*, and the former responded potentially the thoughts problem with narra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coming home twice. 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ssibility and possibility of ‘homecoming’, *Black Steed* re-opened the ‘ideological way’ of intellectual continuous ‘homecoming’, i. e. ‘return to the people’. Zhang Chengzhi delivered his own distinctive thinking about the ‘intellectual way of life’, and thus, brought about much tensions countering the ‘1980s’ in thoughts and aesthetics.

Keywords: *Black Steed*; narratives of ‘homecoming’; intellectual way; *Hometown*

[责任编辑:陈忻]